

# 反本开新: 探寻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杨晓华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哲学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如何梳理和认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历程,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复杂格局中,定位自己的发展路径?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的重要活动之世界华人哲学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40多位著名华人哲学家、思想家共聚一堂,就以上主题展开讨论。

## 中国哲学的当代挑战

在新旧交替之际,每一个积极寻求发展道路和思想转化的民族都存在路径选择上的文化焦虑。冯友兰先生曾经抽取周易中的词汇,将这种处境概括为“旧邦新命”。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冯友兰先生的提法可以转换为“新命旧邦”这样一个主题,强调更加主动地推进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探求更好的思想境界。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认为,当代世界可能面临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向第二次“启蒙”的后现代社会转型。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

深层矛盾不断引发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已经成为片面的“工具理性”,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宰制他人的工具和放纵私欲的借口。面对这种历史状况,人们在努力反思和探寻新的发展的可能性。这对于以实现民族复兴为时代主题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地坤看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可以分为3个历史时期,即:明末清初,中国人开始接触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清末民初,比较注重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的传播;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西哲学走向融合,中国哲学走向独立创造,其最为辉煌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新中国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沈青松从梳理中华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建设的路径出发,认为中国哲学探索经历了“习取西方近代哲学与现当代性”“中国哲学复兴”“中西融合体系的形成”3个阶段,并在当代条件下面临着全球化和后现代化

的挑战。

## 中西经典的现代诠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两个思潮,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即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另外一个“国学热”。这两种思潮同时勃兴,表明人们希冀在东西方双重文化资源的张力中,更深刻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林毓生认为,发现中国人对圣王与圣人有很深的崇拜,并以一整套的礼仪观念进行发展与巩固。即使在一次次对“圣王”的追寻失败后,儒家仍然坚信“内向超越”,希望通过教育实现人性的提升,从而“致君于尧舜”。这种思想使得儒家难以在现实中寻求济世杠杆,从而陷入乌托邦的反复追求之中。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认为,《易经》中卦象爻辞的象征意义进行了现代的考解。他认为,透过易经的文本,我们可以体会到3000多年前,先民在大地上遭遇的困难处境和艰辛生活,这种经历激发了他们的克服万难的动力,从而转祸为福,逢凶化吉,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

清华大学教授陈来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意识着眼点在于国家、政府、权威的必要性,和霍布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公理性判断较为接近。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甘阳认为应重新从中国哲学的理路本身中理解中国哲学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新平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中华文明,仍然会在自我坚守和坚持开放的张力之中,凝聚共识经受挑战。

北大哲学系教授赵敦华认为,无论是彼得拉克对古罗马修辞学传统的恢复,还是洛伦佐·瓦拉对经院文风的批判,还是爱拉斯谟对经院哲学的颠覆,新兴古典学都在传统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这一事实表明,经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思想材料,每一时代的新作在经典传承中灌注生机和活力。

## 努力探究理论和实践的联结

哲学不能代替实践,但是哲学可以努力探究理论和实践的联结。山东大学教授谢文郁探讨了儒家仁政的思想和实践机理,认为儒家把社会情感的诚、孝、

信、尊等,作为连接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用修身养性为培养社会精英的主要途径,以广泛深入的礼教机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以科举制构筑政治领袖的产生机制,从而形成一个强调社会责任、影响深远的责任政治的仁政社会。

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蒋韬把以赛亚·柏林和庄子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对比,他用以赛亚·柏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想审视庄子的自由哲学,发现庄子对两种自由的表述都极为精辟,其消极自由的思想更是独树一帜。“化”“游”“忘”都表现出庄子对消极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过分集中在精神自由方面,没有发展出一套探讨政治生活的政治术语,没有触及现实中的国家权力的重新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提出,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着关于世界与人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在成就世界与成就自身的过程中,实践智慧连接了对世界的解释和对世界的变革,展示了价值关怀与理性追求的统一。

# “新汉学”应面向当下面向世界

本报记者 刘 茜

11月3日至5日,由国家汉办、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国内外百余位汉学研究者与会。学者认为,此次大会提出“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

## 重心:面向当下中国

汉学被定义为中国事物之学,传统上包括语言、历史以及文化。它“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汉学经历过寻求风物、风情的游记汉学阶段,寻求译介、容纳的传教士汉学阶段,寻求学科建制的学院汉学阶段,时至今日,已涵盖海外关于中国的全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在介绍汉学的发展历程时如此说。此次大会的主题为“汉学与当今世界”,旨在讨论如何通过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我国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介绍,“新汉学”在2010年左右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被提出,相较于以往的汉学研究,“新汉学”这一概念正被广泛提及。其中一种提法是基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亚太乃至全世界格局的改变,提出要超越“旧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应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研究,即“新汉学”。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是秉承着一套独特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要理解中国,必须置身中国的语境下,而非透过西方文明的三棱镜。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张隆溪说,在西方,汉学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边缘学科。现在,汉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汉学”的提出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

## 角度:求同或求异的多元探索

多年以来,汉学或西方中国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内地及港台学者大多倾向于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

传统方面,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张隆溪认为,传统的汉学,只是从西方角度来研究中国,而现在中国学者开始把全世界的汉学学者请到中国,这也是一种“新汉学”研究现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提出,不应该将从事域外汉学研究称作“自我殖民化”。针对西方中国学中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使国内学术界与国外汉学界展开学术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叶隽认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针对西方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要有能力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走出去。

海外学者更多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看问题。德国汉学家梅嘉乐教授提倡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她举例说,谭盾的音乐中有很多欧洲乃至非洲的元素,如果你仅仅看到其中中国的那部分,就无法充分了解他的音乐。她说即便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其实也是融合了世界很多其他地区的文化,所以从跨文化的角度可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多重方面。斯洛伐克科学院的汉学家高利克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对话与合作的当今世界,我们有必要遵从孔子“和而不同”的箴言。

学者们对汉学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国家汉办高级顾问纪宝成教授说,一两个世纪以来,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现代化的旗下,科学主义、工业主义、消费主义肆意泛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讨论不同文明的开放互动、相互借鉴、共存共荣,来应对和解决上述共同的当代人类难题。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呼吁更多汉学家到孔子学院任教,“振兴汉学,发展新时代的汉学”。据她介绍,国家汉办正在实施“孔子新汉学计划”,将邀请国外青年汉学学者来华,通过中外合作培养等方式支持世界汉学研究。

总体而言,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汉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方法的多元、学科的会通、中外的互涉。本届大会涵盖了比较研究、翻译研究、接受与影响研究等传统汉学领域,也扩展到“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等热点问题的探讨。

见,该剧中较好地体现了人物和音色、唱腔之间的黏帖。众所周知,歌剧是抒情性的艺术样式。《赵氏孤儿》中充满着丰富和复杂的情感,比如屠岸贾和赵氏孤儿之间“弑父”和“养育”的矛盾情感;程婴和赵氏孤儿之间、程婴和公主之间、程婴和妻子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为咏叹调和重唱形式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

以西洋大歌剧的形式创作的中国歌剧《赵氏孤儿》在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的统一、协调上体现得比较充分。优美、哀伤的《摇篮曲》贯穿始终,剧中所有人物的死亡都伴随着这个音乐主题。咏叹调与宣叙调交替出现,大量的重唱、合唱等声乐形式使整部歌剧音乐连贯并有极强的音乐动力,同时又展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因此,无论是人声还是乐队,这部歌剧无疑都是交响化的。由此可见,歌剧《赵氏孤儿》的创作模式体现了中国歌剧创作逐渐走向回归歌剧艺术本体的道路。

# 走进老百姓的门槛

## 《中国作家》“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高 昌

视但实际上又很重要的文体,比如影视剧本。《中国作家》杂志社10余部作品同时获得这一奖项,体现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担当,难能可贵,对于当下许多刊物的发展及文艺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启示。

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认为,“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展现和呈现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境界宏大,民生化倾向鲜明。何建明认为,提倡关注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五个一工程”的一种导向和提倡。我们都应该重视和提倡那些思想内容好,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升,同时又有市场,受到老百姓欢迎的作品。

著名编剧王兴东认为,编剧只有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门槛,才能走入老百姓的心坎里,才能让观众走进影院的大门槛。如果只是一味在那儿拼凑、组装、克隆、“山寨”,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别人?作品要上去,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爱。著名评论家袁喆认为,《中国作家》恢复上世纪80年代的优良传统创办影视作品专号,开创了新世纪的独特方向,促进了许多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表,也使得大量优秀的影视作品与广大观众见面。

著名作家柳建伟认为,应该思考传统艺术形式和传播力强大的影视艺术相结合的问题。评论家肖惊鸿说,不但要深入作品,还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背后作家的创作历程。“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家林那北表示,获奖是快乐的,但作家不是为获奖而写作的,作家应该一步一步以自己的文字向整个世界“宣誓”。

《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表示,现在文学不能简单为政治服务,但是文学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作家》将坚持用最优美的中文,表现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赵氏孤儿》是一部用西方艺术样式呈现东方人性光芒的剧目,令人赞叹和欣赏。其显著特色是舞台上未见制作精美、逼真的古典式亭台楼阁、街巷院落,仅仅一个15度倾斜的巨大斜面平台,一个飘着纱幔挂着图腾并充满写意性的公主寝宫,一个略显简陋的茅草房就是这部歌剧的主要舞台置景,简洁质朴中体现了中国写意性的传统美学特征。

歌剧《赵氏孤儿》是按照西洋正歌剧的方式创作的三幕六场分段式歌剧,全剧以咏叹调和宣叙调相交替,以宣叙调代替对白,每幕都有标志性的咏叹调和精彩的重唱,显示了该剧连贯的音乐结构和完整的音乐构思。编剧邹静之对原作的故事和情节进行了必要的剪裁和删减。三幕六场的歌剧结构将主要情节锁定为“程婴救孤”的过程,而对奸臣屠岸贾的残暴狠毒,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等

表现较少,并放弃了原作中许多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将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凸显程婴善良、勇敢、机智的人格特征。对屠岸贾、公主、程婴妻、赵氏孤儿等人物间复杂的情感纠葛,采用画外音的形式用对唱和重唱加以呈现,使剧情发展的脉络和剧中人物关系显得简洁、清晰。这种画外音形式不仅给这些人物的提供了咏唱的空间,而且加强了整部歌剧的音乐性。如剧中第三幕,赵氏孤儿知道自己身份和经历之后极其矛盾,对程婴鄙夷地唱出《你竟然是我的父亲》之后八重唱(程婴、程婴妻、赵盾、公主、公孙杵臼、屠岸贾、将军韩厥、赵氏孤儿),作

曲家具匠心独运地用音乐的形式强烈地展现了人物之间复杂、矛盾的情感纠葛,通过这种方式将全剧情节推向高潮。由此可见,歌剧《赵氏孤儿》踏踏实实地在剧本改编和音乐创作上做了积极的努力,在运用音乐主题贯穿手法和展开音乐戏剧性结构方面均体现了回归歌剧艺术本体的思维。歌剧与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叙事性不同,它自身并不具备直接叙事的功能,因而需要借用多种不同媒介进行转换,从而间接地完成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正是基于此,歌剧必须将各种歌唱和音乐的形式为媒介将文字转化为声腔和旋律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

# 回归歌剧艺术本体

## ——看原创歌剧《赵氏孤儿》

刘 曠

上说,歌剧与中国戏曲具有相似性。事实上,多年来《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的常演不衰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原作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具有明显性格特征和不同个性的,这些形象本身就包含着年龄、性别等差异。所以,戏曲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和歌剧的人声分类(男女高音、男中音等等)恰好可以成为表现叙事的功能,因而需要借用多种不同媒介进行转换,从而间接地完成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正是基于此,歌剧必须将各种歌唱和音乐的形式为媒介将文字转化为声腔和旋律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

# 评孙若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刘 凡

孙若风新著《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期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缘起、内涵和途径,记录了相关重大事件和典型细节,涉及文化发展诸多突出现象和关键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文化传承、文化改革创新、文化队伍、文化制度等等,在梳理党和政府文化政策的同时,采撷来自社会、民间的文化创造,从而展现了21世纪初叶中国文化的崛起进程和风情画卷。

文化强国的提出,是文化自觉自信的证明,是社会上文化发扬蹈厉的精神表征,更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先声。文化复兴既是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与前奏。因为文化强国的提出,当代文化建设实现了具有未来指向性的品格提升。作者将文化强国的命题置放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新过程中,特别是揭示了与中国共产党性质和使命的深刻关联;文化强国是中国人的百年情结,是与民族复兴相联系的精神大义。历史把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从来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己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一贯依重文化、发展文化的逻辑必然,又体现了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对于文化特征和综合功能的深刻把握。作者还认为,为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包括精神准备、社会准备、理论准备和文化自身的基础准备。作者的这些描述展示了文化强国的历史由来和现实根基。

文化强国的目标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必然给这个目标留下最鲜明的印记,它决定了中国将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和怎样建设文化强国。作者在书中提出,以人民为文化主体,实现文化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要义。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醒目坐标,决定了文化推进的性质与过程,赋予了这种文化推进以新的人文光辉和理性精神。作者把握了当前文化建设的这种内在规定性,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这也是该书突出的新意之一。

以人民为文化主体,融合了长期以来我们党所坚持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和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讨论成果,最直接的来源则是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原则,该书就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and 论证。作者认为,在文化建设中,人民群众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客体,而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创造者,并且不是被动享有,而是主动享有,不只是自发创造,更是自觉创造。把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大众情怀进入文化建设优先考量的价值层面,这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进一步突显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强调的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从法规维度强化了人民的文化地位。而执政为民理念的不断深化,则把以人民为文化主体当作天经地义的执政伦理。作者的这些认识是有着现实针对性的。

目前在文化建设研究中存着“主体”概念滥用、误用的现象。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不少学者把“以政府为主导”引申为“以政府为主体”,也值得商榷。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文化上的科学发展,是要统筹协调文化建设的各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处理好重大文化关系,实现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作者分析了形成这种发展观所经历的由潜在而显的嬗变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四位一体”,文化建设得以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协调推进;十七大又提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开创文化建设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为实现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且提出作为强国的综合性目标,在加快文化发展的同时注意到发展的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认识上有一个清晰的演进脉络,即从重视文化发展,到加快文化发展,再到努力实现文化的科学发展。这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时代特征在

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体现。应该说,作者是在时代成因与文化本因的建构上把握并揭示了当前文化建设的思路特征和发展趋势。

作者还认为,在文化建设中,把人民作为主体和坚持科学发展,体现了目标与途径的统一,方向与方式的统一。在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要靠文化的科学发展作为基础,文化的科学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运用于文化建设更表现出独特的辩证智慧。它对种种文化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对一些偏颇的防范和矫正,目的是要寻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从更深层次看,则是警惕在人民大众文化利益上的价值失衡。作者的这些见解对于在文化建设中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有着启发意义的。

政策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杠杆。作者以各类文化政策的出台为线索构建全书的框架,串连相关的重大事件和典型细节,并且揭示出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追求。作者在政策部门工作,而且曾有过新闻从业经历,这决定了他观察、思考和表达的特点,但更多还是出于他对政策作用和政策背景重要性的认识。

气盛则言宜,心雄则声壮,在文化强国目标支配下,该书洋溢着卓尔奋发的气息,显示出与这个雄视阔步的时代相相应的宏阔胸襟和泱泱气象。这使人联想到,因为有了文化强国的提出,自信自强,昂扬向上,当成为当今中国多样化文化生态的基调 and 底色。此外,该书将纪实与阐发相结合,力求在生动、直观的表述中有深入的思考 and 独到的见解,这种通俗化的努力,正是遵循“以人民为文化主体”的体现。

该书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的最早专著,多少带有“急就章”的痕迹,在一些方面思考还需要深入,表达上也没有完全达到作者所期待的通俗化。文化强国目标提出后,应该形成与之相应的思维、战略乃至于话语体系,作者是想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但还是开了个头,这实际上反映了建设文化强国开局时的研究状况。